

西湖旅遊和杭州出版的交會

馬孟晶

明商維濬刊本《西湖遊覽志》的淵源與特色

《西湖遊覽志》是罕見的標舉遊覽之名的名勝志，由杭州在地的田汝成在辭官歸田後輯撰而成，可說是歷代西湖書寫中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者。它的出版史與其內容一樣精彩。最初由杭州知府贊助而得以在嘉靖間刻印，萬曆前中期又有兩位派駐杭州的官員助印再版，但更特殊的是萬曆末年商維濬大幅改寫並重新刻印的商業性版本，這是史上稀有的由民間商業書坊發行的地方志書。商維濬為何要大費周章投資於一本名勝志？和遊覽之名又有什麼關係？這本《西湖遊覽志》的出現，不但讓我們更加瞭解晚明的西湖，也可以讓我們一窺在出版勃興的晚明，杭州旅遊書籍出版的一隅。

《西湖遊覽志》的緣起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十七年（一五三八），嘗試春官，適予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也，便輟裝，不果北上，來遊西湖，盤桓累月。（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十）

黃省曾（一四九六—一五四六）為吳縣（今蘇州）人，嘉靖十年（一五三一）舉人，生平喜好遊覽名山大川，故自號五嶽山人。在這段於晚明筆記文集中常被轉錄，流傳頗廣的軼事中，他甚至還因為嚮往錢塘（今杭州）人田汝成（一五〇三—

一五五七）所述的西湖景觀，而瀟灑地放棄赴京應考，改往西湖停留經月。萬曆《錢塘縣志》〈紀獻·寓賢〉中說他們同遊西湖各處景點，「湖山之勝，足跡幾遍。談說形勝，窮狀奧妙，歌詠隨之。」田汝成也在同年將兩人唱和的詩作一起集結出版為《西

湖遊詠》。

田汝成的仕途較黃省曾順遂，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得中進士，隨後並曾在南京、廣東、貴州、廣西、福建等地任官，退休後則回到故鄉杭州。他對考察地理形勝、記錄風俗掌故很有興趣，著有《炎徼紀聞》、《龍憑紀略》等，記載西南邊地各族風土之見聞。黃省曾則曾著有記錄蘇州風俗的《吳風錄》，兩人顯然氣味相投，故能結為莫逆之交。他們之間的西湖因緣並不只《西湖遊詠》一書。田汝成自言：「海內名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獨無，詎非闕典？曩歲五嶽山人黃勉之嘗謂予曰：西湖無志，猶西子不寫照，霓裳不按譜也，子盍圖之。」（田汝成，《西湖遊覽志敘》）在好友的鼓勵之下，他留心收集各種史料與軼聞，編輯撰寫為《西湖遊覽志》和《西湖遊覽志餘》，並於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刊行，完成對於黃省曾的承諾。

西湖和杭州之志書出版

《西湖遊覽志》並非最早出現

的名勝志，但冠以「遊覽」之名卻相當特殊，這和西湖的旅遊之盛脫不了關係。杭州與西湖早在宋代已經是重要的旅遊勝地，尤其在南宋時成為都城，繁華自不待言。但也正因杭州彼時還具有政治性的功能，和明代之後遠離宮廷、位居水陸要衝、工商繁榮的景象仍有所不同。而且除了文人士子之外，一般民衆也熱衷於遊覽西湖。杭州一帶不但有西湖的湖山之美，人人得以欣賞，又素有「東南佛國」之稱，在西湖畔有許多歷史古剎和香火鼎盛的廟宇，吸引衆多進香的民衆，這也是西湖旅遊興盛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明代的杭州與蘇州，可能是遊人最多的景點。蘇州之虎丘與杭州之西湖都因位於歷史名城的近郊，而且交通便利，更成為旅遊者首選。但相較於半日足可盡遊的虎丘，西湖與周邊的數座山峰佔地頗廣，名勝史蹟甚多，歷史發展也較為複雜，遊覽時需要有所規畫，對於資訊的需求也就更加殷切。

《西湖遊覽志》的出現不但與地域特性有關，也應放在更大的脈絡中

來看。明代文人對於旅遊書寫的興趣和投入，轉折的關鍵約在嘉靖、萬曆時期，走訪各地之紀遊文章在數量上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此時也是各類志書的出版變得普及與逐漸定型化的時期，許多州縣與名山寺觀也在此時出版了第一本專志。這個現象應是肇因於士人階層的擴充、他們對於地方社會的參與、乃至地方意識的勃興。

（註一）但在此普遍的趨勢中，浙江地區出版方志和刊行山水與機構專志的風氣似有獨步全國之勢，杭州與旅遊主題書籍的關係更特別引人注目。錢謙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在〈越東遊草引〉文中曾抱怨說：「今杭城刻名山記累積充几案」，可見在當時人的心目中，杭州即以名山勝景的相關出版品而著稱。西湖旅遊既向來與杭州密不可分，當旅遊書寫在嘉靖年間興起之際，也正是書籍從抄寫轉向刊刻的風氣逐漸形成之時，杭州又早已有經營出版事業的堅實基礎。《西湖遊覽志》的出現，可以說是在諸事具足的情況下水到渠成，也開啓了杭州地區旅遊書籍出版的新紀元。

《西湖遊覽志》的內容

《西湖遊覽志》共二十四卷，內容記述西湖畔和杭州城的名勝，田汝成在序文中自言乃「敘列山川，附以勝跡」，是以空間區畫為主體架構，再分別敘述各個景點的發展。他在序文中也強調西湖和其鄰近之山與杭城之密不可分：「若非元本山川，要原別委，則西湖之全體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摹寫西湖也。」書中首先說明西湖整體概況，再依孤山三堤、南山、北山的順序，整理各區中的重要景點或建築；然後描述南山城內、南山分脈城內外、北山分脈城內外與浙江之勝跡。各個景點除了說明其興立、及截至他當時為止的沿革之外，也常附記古今名人題詠的詩句。《西湖遊覽志餘》則共有二十六卷，「裁剪之遺，兼收並蓄，分門匯種」，將歷代與西湖相關的人物典故軼聞按主題分類編排。兩者互補，既如志書，也述史實或傳聞，是第一本以西湖為主題的專志，疊合目見之景、耳聞之歷史記憶、及古今人的題詠文學於一書。這個體例十分特殊，和之前的方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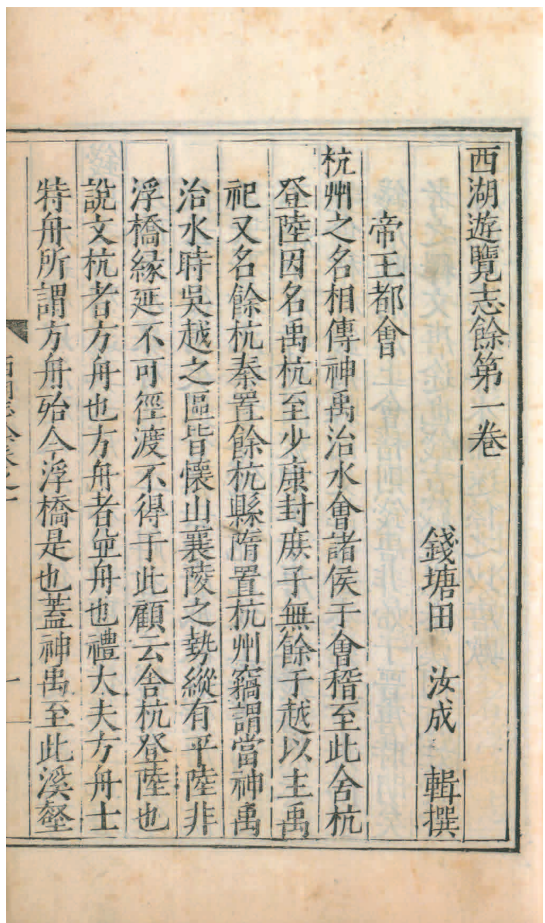
或名山志都不相同，《四庫總目提要》便稱其「因名勝而附以事跡，其體在地志、雜史之間。」

卜正民指出，明清地志或機構專志和郡邑方志的內容與組織多有重疊，甚至都是找同樣的地方官員與閭人寫序，凡例和附圖也很類似，只是加進更多詩文之作（註二）。之所以為名山勝地或寺院祠廟作志，總是希望「賴志乘表彰垂不朽」，「輔以郡邑之不及也」（註三）。若以成書略早於田志之正德八年（一五一三）刊刻的《京口三山志》為例，除了在第一卷的〈總敘〉裡歷述三山的走勢、其間名勝、並以小字註明個別沿革，和田汝成之《西湖遊覽志》主要內容較為接近的極小篇章之外，其他卷的內容與編排主要沿用方志的體例，若從名勝的角度來看，卻顯得駁雜失焦。西湖成為旅遊勝地之發展既久，寺院亭閣等景點眾多，歷代著名人物及其詩文題詠數量也相當驚人，收集資料固然不易，內容的組織和呈現也更為重要。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一的〈委巷叢談〉中，曾討論了

前三次的官紳刊印本

除了《西湖遊詠》之外，田汝成在嘉靖年間曾經刊刻過多本自己或他人的著作，對於出版並不陌生。但相較於個人性的文集，這套書的卷帙浩繁，當非個人之力所能刊印。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敘〉中提到曾有多位官員閱覽過此書，皆深為嘉許、視為郡史，並承諾助印，但最後是在嚴寬任杭州知府時，在其他官員捐贊共襄盛舉之下，方得以成其事。

今日存世的《西湖遊覽志》刊本



圖一 《西湖遊覽志餘》 明嘉靖丁未刊萬曆甲申浙江巡按范鳴謙修補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數量不少，但版本十分複雜。主要是因為成書之後，在萬曆期間曾先後有三次重刊，因應於景物的變遷，對內容也有程度不一的增刪。首先是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江陰范鳴謙的重修本，繼之為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杭州知府季東魯的重修本，而後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商維濬再度改編並出版。

范鳴謙在〈西湖遊覽志序〉中提到，他素來喜愛西湖，也喜歡讀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甚至「買梓一

從宋代到當時的各種版本之杭州方志，並分析其缺失所在，顯然覺得這些早期的地方志書都不甚令人滿意，他也必定曾經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比較起來，他組織各個地點的方式很顯然帶有規畫旅遊路線的意識，以景點作為統攝全書的條目，其下僅收錄主要的歷史興廢。條理清晰，利於檢索，很適合作為旅遊導覽之用，在地志的發展尚未完全定型的此時，可說是十分具有創意的體例。尤其將人物、詩文、與雜聞另編為《西湖遊覽志餘》，更巧妙地避免了枝蔓龐雜的弊病。田汝成以五十卷之多的文字為西湖留影存真，應是出自地方士紳亟欲保存一地文化傳統與歷史記憶的深切用心與強烈認同感，但也正如《明史·文苑傳》稱田汝成「博學工古文，尤善敘述」，他寫景敘事的功力亦屬不凡，所以能成為西湖書寫的標竿性著作，對於後代的西湖志書、小說、或其他西湖書寫文類的影響極為廣遠，其內容和架構屢屢為後人所援引，或視為亟欲超越的對象。

至湖上，輒按志而索其處，依依不能去」。顯然《西湖遊覽志》對時人而言確實具有接近旅遊指南的功能。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他奉命巡視兩浙而入杭，正當兵民遞變之後，湖山黯淡，海內之士猶「相戒引避不肯入」，及至次年方復見昇平，於是決定重刊《西湖遊覽志》：「湖山在目，而文獻靡微，可乎？於是捐贖錢，檄郡丞喻均校其漫漶而屬諸剞劂，俾後之觀風者，采而斟酌焉。則武林之風，勿慮其終靡也已。」嘉靖晚期杭州頗受倭寇侵擾之苦，西湖旅遊也受到影響，可能要等萬曆初年才逐漸恢復昔日光彩。由地方長官主其事的西湖志出版行動，似乎也有傳承歷史文獻、寄望榮光再現之意。（圖一）

十多年後，任杭州知府的季東魯體認到西湖對杭州之重要，以及應該保存相關史志，但他也已感到舊志兩種刊本的漫漶，恐其不傳，所以「乃令生徒校而補之，捐俸再梓。」（出自季東魯，〈重修西湖志跋〉）季東魯本和范鳴謙本的內容很相似，文本只有極小的出入，兩者最主要的差別是前者加入

一人。他在萬曆八年（一五八〇）曾經刊印過大部頭的歷代筆記小說叢書《稗海》與《續稗海》，標為半壁堂刊，頗具聲名。根據他為《西湖遊覽志》所寫的序文，他在萬曆中期以後便已移往杭州，卜居於西湖畔的樓外樓。除了半壁堂之外，商維濬刻印的部分書籍則繫於繼錦堂之下，很可能便是稍後在杭州刊印者。部分商本重訂之《西湖遊覽志》版心未作額外的標示，或許即是原始刊本。傳世另有



圖四 《西湖遊覽志》扉頁 讀書坊商刊本 上海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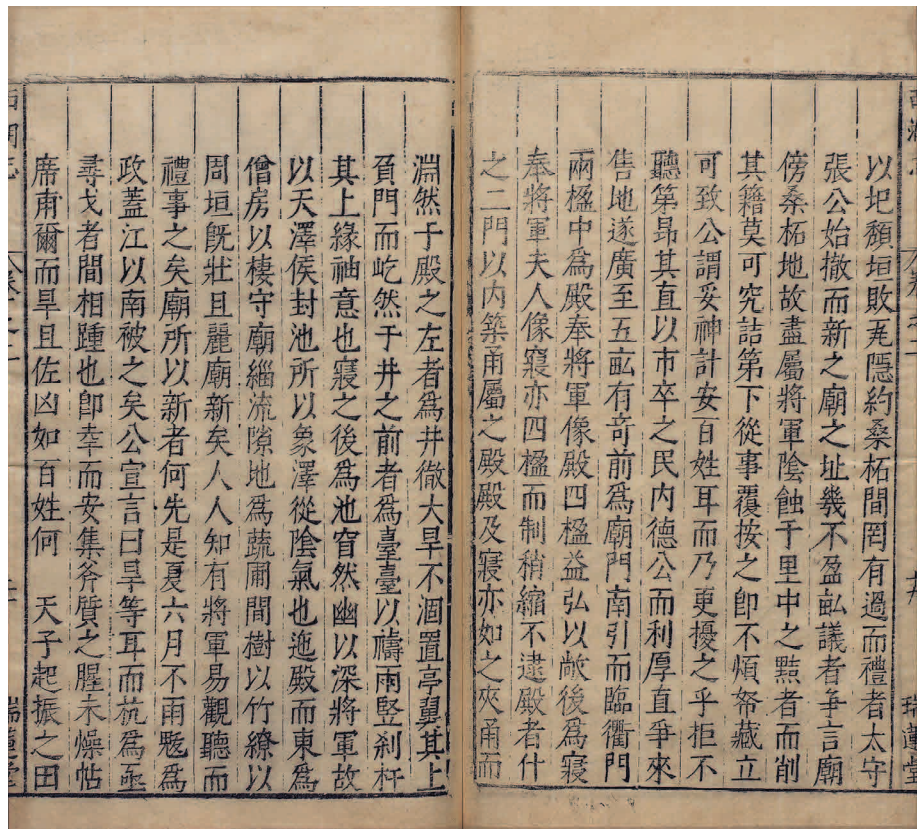
圖三 《西湖遊覽志》扉頁 瑞蓮堂商刊本 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部分刊本，包括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原藏於北平圖書館的刊本，則是在卷二與卷三等部分書頁的版心下標示有「瑞蓮堂」（圖二），可能是再經過局部另行雕版刻印的書頁。在東京國立公文書館所收藏的瑞蓮堂刊本仍保存有扉頁，可知此版的完整書名為《校增西湖遊覽圖志》，瑞蓮堂則是位於會稽。（圖三）第三類如上海圖書館藏本，主要文本與前述兩本相同，但附加一扉頁（圖四），除了以「新增西湖遊覽志」為題名外，還標明「商衙繼錦堂藏板」和「武林讀書坊藏板」。讀書坊是杭州著名的書坊，出版的紀年書籍主要是集中在萬曆後期到崇禎年間，活躍年代明顯晚於商維濬，因此或許即是以商維濬的刻版再次刊行。這麼大部頭的書籍在晚明經過如此多次的刊印，可見應該是在市場上頗受歡迎之作。

商本《西湖遊覽志》的排版與之前三個版本完全不同，雖維持每半頁十行，卻將每行二十字改為二十一字，這意味著必須全本重新排版與雕版的大工程。到底商維濬刊本對於范刻本或季刻本做了那些改動呢？尹曉寧指出，商刻本更動了二十多個條目，增加了六七千字，較前兩個版本的變動幅度大了許多。（註五）商維濬的編輯方向與范鳴謙本大致相同，並未去調整田汝成本的主要結構和條目，但依照西湖現況而增刪個別條目，或增加因應近數十年內的新變動而生的新景點之條目。

我們若比對這些文字後可以發現，商本之所以有那麼多文字的增刪，是因為萬曆中後期西湖周邊的景況產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主要是出自司禮太監、時任蘇杭織造的孫隆捐己之資贊助所致。根據晚明著名小品作家張岱（一五九七～一六七九）之《西湖夢尋》（一六七一自序）書中所述，我們得知孫隆參與建設的西湖景點甚多，多有具體紀年，約在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到二十八年（一六〇〇）之間。尤其萬曆十七年修築的斷橋下的十錦塘，「堤闊二尺，遍植桃柳，一如蘇堤」，也有孫堤之名，讓他幾乎得以和歷史上以修堤留名的幾個地方長官並稱。商本卷

了季東魯的跋文。這兩次重刊都是由地方行政長官出資，主要是希望傳承地方史事記錄，在內容上改變並不算多，只是將晚近的新發展略作修補。



圖二 《西湖遊覽志》瑞蓮堂商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二版心下標示「瑞蓮堂」。

由於田志的原始雕版便存放於杭州府中，（註四）易於取得完整的內容，主事者在編輯時只需將文字有更動者與其後數頁作局部的增刪即可，即使累經修訂改版，最後呈現的頁數並沒有太大的變動，雕印之力便較為輕省。由此也可見證中國傳統的雕版方式有極大的彈性。

我們若比較傳世的刊本，上海圖書館藏嚴寬刊本用紙精潔堅韌，墨色均勻，刻印水準俱佳。范鳴謙本存世有國立故宮博物院（僅存《西湖遊覽志餘》）、北京大學、北京科學院、浙江圖書館等藏本，用紙較嘉靖刊本薄脆，現存圖像多處有漫漶不清者，雕版狀況可能也較不如前者。季東魯本則見藏於浙江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地，用紙也偏脆黃。整體看來，後繼的范本及季本這兩個刊本所使用的紙墨材料與印刷情況都無法和嘉靖間的初刊本相比。

書坊暢銷新編本：商維濬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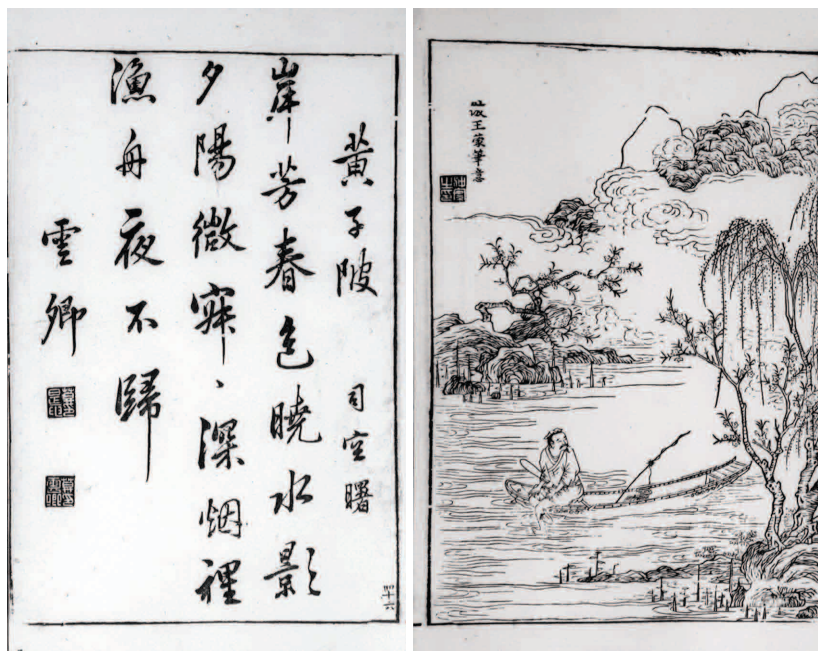
對田汝成本《西湖遊覽志》之全本改動最多的是萬曆四十七年

（一六一九）的商維濬刊本，這也是目前傳世最多、影響也最大的版本。商維濬在《西湖新志序》中說：「執昔日之志以觀今日之西湖，志與湖必有相左而不合者也，豈其描寫未盡工，識紀未甚習哉？予於是新其故籍而次第之，竊謂今日之志，志今日之湖，庶幾近之矣。」商維濬此刻最重要的目標顯然是要反映當下西湖的情況，也因而較諸之前兩本有更多的改動之處。書中各卷之首雖然都標為商維濬重訂，但在卷二「湖心亭」條下曰：「會稽光祿商維濬屬仁和諸生張之采增輯湖志」，可見全書的具體編撰改寫者應為張之采。

商刻本傳世的數量較前幾種為多，但版本問題也更為複雜，至少有繼錦堂、瑞蓮堂、讀書坊三種刊本。來自會稽的商維濬或稱商濬，由於在標明商維濬重訂本《西湖遊覽志》的前面所附題記有「會稽商濬題並隸」，此書中「浙江省城圖」後的題跋也出現「商濬」、「半壁堂」的印，各卷之首所題之重校或重訂者也有兩種說法交錯出現，兩者應該為同



圖八 雷峰夕照圖與題詩 商本《西湖遊覽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黃子陂 五言唐詩畫譜 萬曆晚期刻本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主要讀者群的遊人之需求列為首要之務。同時期遊記中常會提及孫隆的新建設，如高攀龍〈武林遊記〉描述他在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也就是孫隆整修十錦塘後一年遊西湖的見聞，便已提到「中貴孫隆新葺」之堤。可

插圖的增加與精緻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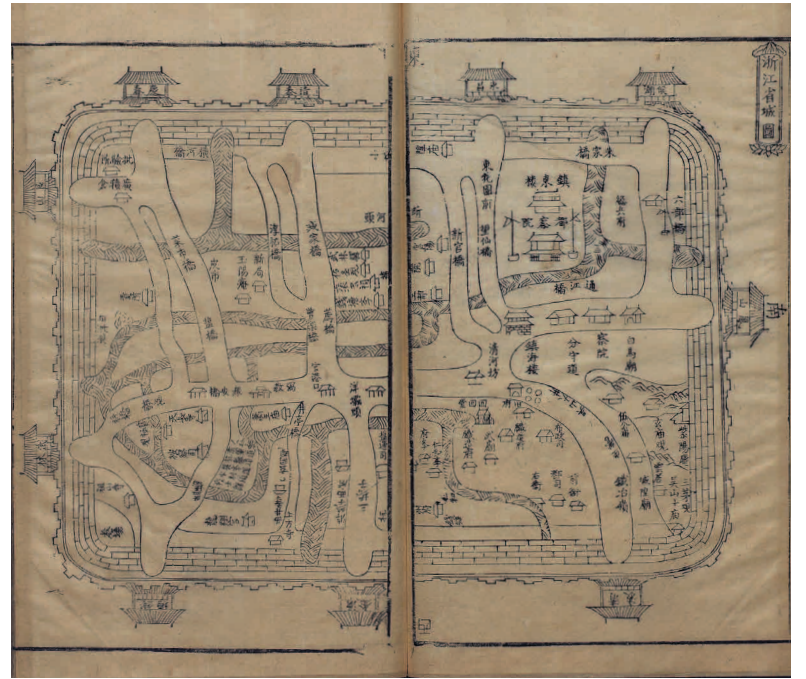
商維濬刊本與在他之前三個由地方長官出資或重刊之版本最大的不

同，是以大幅修訂增加的文字即時反應西湖在萬曆中後期的大舉建設。另一個重要的變化則是圖像的大幅增加與精緻化。田志自初刊本便已附有圖像，但和傳統方志中的附圖取向較為接近，只為示意而已。商維濬本《西

湖遊覽志》時便已如火如荼地進行，但季本卻隻字未提，雖然我們無法斷定具體的原因，但可能是因為季東魯更希望突出西湖利於國計民生的水利之效，而非旅遊娛樂的層面。至於商維濬這樣的商業書坊，自然是以營利為主要的考量，勢必要將

後「煥然一新，遊人駢集」；風篁嶺上的一片雲石也是在孫隆構片雲亭後「遊人倚徙，不忍遽去。」孫隆的建設對於西湖的景觀與旅遊活動的幫助甚大，但地景改變之巨也促使商維濬必須大幅地改寫原志。

魯重刊《西湖遊覽志》時便已如火如荼地進行，但季本卻隻字未提，雖然我們無法斷定具體的原因，但可能是因為季東魯更希望突出西湖利於國計民生的水利之效，而非旅遊娛樂的層面。至於商維濬這樣的商業書坊，自然是以營利為主要的考量，勢必要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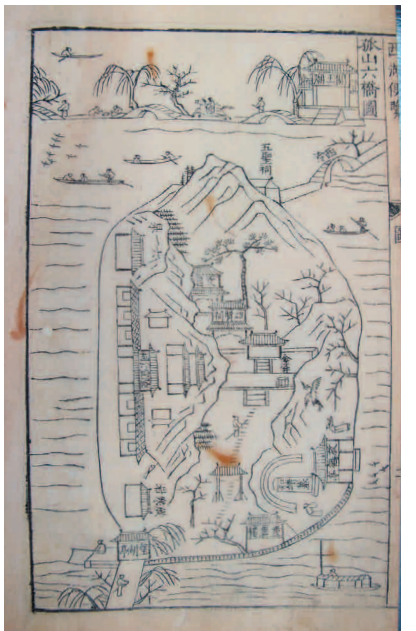
圖五 浙江省城圖 商本《西湖遊覽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湖山一覽圖 商本《西湖遊覽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孤山六橋圖 商本《西湖遊覽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孤山六橋圖 西湖志摘粹補遺悉囊便覽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西湖遊覽志》裡的圖像共有二十一幅，均是合兩半頁為一圖的大小，內容則可以分為三類：一種是接近於傳統方志中的附圖，如田志中已有的〈宋代京城圖〉、〈國朝省城圖〉（圖五），以古今之杭州城圖相互對照。〈湖山一覽圖〉是西湖全境的景點標示圖（圖六），只求標出相對位置，而非忠實地描繪其山水。第二類是局部性地描繪西湖邊由東北往西南方向延伸的幾個最受歡迎的景點區域，如昭慶大佛、孤山六橋（圖七）、岳武穆廟等，共有八幅。第三類則是西湖十景圖（圖八），以前半頁為圖像、後半頁為題記的形式來描繪出自南宋便已出現的

著名的西湖十景。前者反映出現存實境，也是一般的遊客最感興趣之所在；後者則偏向於風雅的想像，從時人記錄中，我們可以知道，晚明時未必可以辨認出西湖十景確切的地理位置，恐怕更多是存在於文人的浪漫懷想當中了。但這卻也像西湖邊上無數經過歷史豐富浸潤的史蹟般，為秀麗景色憑添更多想像的空間與話題性。十景圖前圖後題的形式，和晚明流行的詩意圖形式頗有相通之處（圖九），亦可旁證其並無寫實之意圖。這些圖像其實並非出於新創。除了延續田志較早刊本的地圖之外，多半是從稍早刊印於杭州當地的《西湖志摘粹補遺悉囊便覽》（約一六〇四）（圖十）、《海內奇觀》（二六一〇）、和《西湖志類鈔》（二六一五）等書中的插圖修改而來，因此可說是集大成之作。商本的實境圖像也如其文本般注重即時更新。例如「孤山六橋圖」（圖七）中南山之畔添加的「樓外樓」，固然是商維濬個人的別業，但也逐漸成為湖畔的景點之一，據《西湖夢尋》自序，張岱在清初時猶憑弔其消失無蹤，這

似乎也顯示出商維濬已經成功地融入了杭州的文人圈。

書籍亦成為置入性行銷的空間

另一方面，像商維濬這樣的當代出版人的別業被刻意標示於西湖地圖之上，與吳越錢鏐或岳武穆等歷史人物的遺蹟相提並論，也反映出他想借《西湖遊覽志》的暢銷而將聲名廣為流傳的用心，宛如今日所稱的置入性行銷，也應是商業性書坊經營的策略之一。田汝成的志書前幾次的刊印乃是出於地方官（嚴寬、范鳴謙、季東魯）籌資而刻成，雕板亦存於杭州府內，官方性質濃厚，但並非由官方機構具名之嚴格意義下的官刻本，較近於私刻的意味。這些助刻的地方官員雖無由藉刊刻書籍而牟利，卻未必沒有個人的打算。范鳴謙刊本第二卷中將田本的「西溪別墅」變成了「陸宣公祠」，還特別說明是因范鳴謙「捐贖錢，椒郡修葺，頓還舊觀」，顯然也有想藉此將其政績傳之久遠的意圖。相較於田汝成為西湖的自然景觀與人文史跡保留文獻的用心，刊印《西湖

遊覽志》者無論是基於歷史的傳承或商業利益的考量，往往卻不免有求取聲名的動機。反過來說，這也提醒我們，相較於手抄本，大量印刷的書籍如同是提供了一個宣傳的空間，使得參與者的個人事蹟得以廣為流布、傳之不朽，或許也可說是書籍在傳播文化與知識之外的另類附加功能。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與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註釋

1. Timothy Brook (卜正民),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 (2nd edi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p. 33.
2. Timothy Brook,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 p. 34-35.
3. (清)周鳳祈,《重修虎邱山志啓》, (清)顧貽祿撰,《虎邱山志》,臺北:文海出版社,據乾隆三十一年刊本影印出版,一九八三,頁二十三。
4. 田藝衡,《家大夫小集引》,《田叔禾集》,收入丁丙、丁申輯,《武林往哲遺著》,揚州:廣陵古刻印社,據丁氏嘉惠堂本影印刊行,一九八五。
5. 尹曉寧,《〈西湖遊覽志〉版本問題訂誤》,《浙江學刊》二〇一〇年第三期,頁七十四。